

3 / 1979 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

——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 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我们台湾这些年》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作者: 廖信忠

这几年口号又改啦!“两个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特地将女孩放在男孩之前,希望消除重男轻女观念。后来因为少子化的风潮,又改成“两个孩子很幸福,三个孩子更热闹”,希望民

众多生几个小孩。

总之,我多了个妹妹,只差我一岁而已。由于年龄相仿,所以我跟她不存在什么“哥哥保护妹妹”这种事,反而从小打架打到大:她咬我手臂我抓她头发,吵吵闹闹的,好不热闹。当然这样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家在这一年也留下了第一张全家福:妈妈抱着妹妹,爸爸挽着妈妈,我骑在小木马上。

1979年1月1日零时起,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或者从大陆的角度来说,是中美建交。

当时的台湾当局其实就是陷在这种迷思当中,以中国的正统自居。在蒋中正的时代,一直以极端的原则处理两岸问题,无形中也使台湾的国际空间缩小了很多。

总而言之,“断交”已成定局,民间再多的抗议和自发的政治运动,在大国博弈间也显得软弱无力。台湾少了个靠山,信心不足的人就纷纷移民,在那一年

就有大规模的移民潮出现。于是,才有了蒋经国在那年的除夕谈话“渡过难关”的言论出现。

当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在记者会上表达台湾对“断交事件”的“严正立场”,他凭借英挺的形象,可谓一夕间爆红,成为媒体宠儿。就在那个台湾人心极大动摇的时刻,知名的民歌手侯德健也发表了《龙的传人》这首歌,整首歌词歌颂古老神州的庄严伟大、近代中国的苦难以及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当然啦,这首歌呼应当局的立场,在当局的大力支持下,立刻在台湾及海内外华人间歌颂一时。

而在社会上,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爱台湾”运动。比如,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小朋友在美国与台湾“断交”后,同仇敌忾,捐出自己的猪公扑满来给当局买“飞机大炮”。我大一点儿的时候就想,飞机大炮不还是都跟美国买的吗?这个

故事好像怪怪的。回到正题,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后,美军跟着撤离台湾,取而代之的是“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政府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供应武器给台湾。台湾继续以“自由的灯塔”自居,一方面也是安抚民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谓的“反攻大陆”已经成为笑话,只有当局继续喊得响,底下的响应一年比一年心虚,一年比一年微弱。

当然,美军在台时带来的一些经济活动也随之萧条,许多社会问题渐渐浮现,尤其是美军留在台湾的私生子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许多电影及文学作品探讨的对象。

此外,侯德健后来在1983年潜赴大陆,台湾当局感到脸上无光,遂把《龙的传人》这首歌给禁掉了,当时还成为许多人揶揄的事件。

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台湾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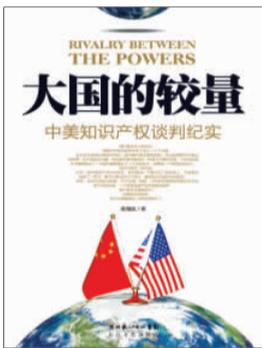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反对党。除了国民党外,名义上还有青年党、民社党等,每次选举他们都会派候选人出来,但根本威胁不了国民党,或者说,这些党只是国民党包养着的,有点儿用来宣传“看!我们还是有其他政党!”的意义而存在。所以,台湾当时基本上还是国民党以党领政、国民党压倒一切的情况。

当时有个词:党外。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时期,台湾社会没有组党的自由。在早期反威权 and 自由主义的组织或个人,是以杂志等文宣来表达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选举的机制,进行进一步的串联和组织工作。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词:白色恐怖。不解释词义,请大家自己去查。这个词对于台湾的意义,大部分就是指国民党自统治台湾以来对异议分子或嫌疑者的肃清及迫害。

37 / 坎特开始煽风点火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纪实



《大国的较量》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 吴海民

在这些貌似公正的通报之后,坎特把话锋一转:“尽管中国已采取重大步骤,但中国境内的盗版行为仍继续存在。中国虽然在追查零售中的盗版行为,但尚未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对大的生产商和零售商采取行动。结果是,1995年,华南和华中地区的34家激光唱盘工厂生产出了大约5400

万张唱盘和视盘,而中国国内市场只能吸收200万到500万张。美国工业部门报告,中国继续进口CD生产线,不久后,它的生产能力可能接近于1年生产2亿张激光唱盘。中国生产的一个光盘只读存储器可以存储1万个美国软件,但在香港零售,可能还不到10美元。我们现在等待着中国采取进一步的决定性行动来履行诺言,结束猖獗的盗版行为。”

他还从市场准入方面攻击中国:“中国在音像制品和电影进口上存在非正式的限额,把进口电影限制为一年10部,还不允许美国的电影和音像公司进入生产音像制品的合资企业。如果市场准入问题不能解决,从长远来看,这将使中国可能采取的任何执行协议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

坎特开始煽风点火了。国际观察家认为,他这番话是在为贸易报复作舆论准备。

4月8日,巴尔舍夫斯基气宇轩昂地飞抵北京。在她身后,还带来了美国知

识产权界的一大批官员,其中包括美国唱片业协会主席伯曼、商业软件协会政策委员会主席伯顿、交互式数据软件协会主席洛温斯坦及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高级官员等。这些官员既是被她动员来给谈判助威的,同时也是前来给她的政治表演充当喝彩观众的。

她一下飞机就对记者发表了态度强硬的谈话。

巴尔舍夫斯基:“我们将在这次谈判中要求中国采取更加果敢的措施打击盗版,不然,我们将会在这个月再次将其列入‘特殊301’的重点国家名单。克林顿总统也将会采取行动来使中国遵守他们的诺言。”

记者:“你这次来华带来了什么具体建议?”

巴尔舍夫斯基:“我将提交中国一份‘紧急行动计划’。”

记者:“能否透露一点计划的内容?”

巴尔舍夫斯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计划,是限定完成时间的计划。”

到了下榻处,巴尔舍夫斯基和随从的知识产权界官员立即开会,听取先行来华的贸易代表助理李森智关于前一段谈判情况的汇报。

李森智是4月1日来到中国的。他先在上海进行了所谓的调查,又在北京与中方代表进行了小范围谈判。谈判内容仍然是围绕美方于2月份提出的4个问题进行的。如果说有什么新东西的话,就是他要求中国至少关闭14家或15家光盘生产厂,并要求在广东、海南、浙江等地延长知识产权的重点执法期。

对这些要求,中方都一一顶了回去。中方认为,中国各地通过集中行动已经使一度猖獗的侵权盗版活动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并已经对6家侵权盗版严重的光盘生产企业给予关闭处罚。如果美方提出关闭更多的企业,必须拿出这些企业侵权盗版的事实和证据。关于延长知识产权重点执法期问题,中方认为,重点执法期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其间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已经转为有

关执法部门的经常性工作,没有必要继续延长。虽然李森智再三纠缠,中方在这些问题上没有退让。

巴尔舍夫斯基特别关心的是市场准入问题。

李森智汇报说:中国没有退让。

根据李森智的这些汇报,巴尔舍夫斯基进一步推敲和补充了她将要向中方提交的“紧急行动计划”,准备向中方施加更大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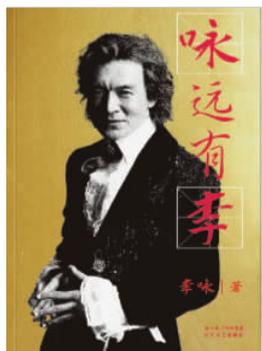
这不过是她的一厢情愿而已。

在她带着精心拟定的“紧急行动计划”走进谈判厅的时候,在她与中方代表握手的那一刻,就有了一种预感——这次谈判也许注定会兴而归。

她敏感地发现,领衔谈判的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并不像她自己那样显得“紧急”,其他中方代表也都不像美方那样显得“紧急”。中方代表的态度非常坦然,非常平静,比以前任何一次谈判都更加坦然和平静。

26 / 《幸运52》来啦!

——央视名嘴李咏自传



《咏远有李》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 李咏

出面接待我的人慢言慢语地向我解释:“你进央视,要占用一个干部指标,但今年广电部没有名额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还在努力。”

回学校的路上我精神恍惚,没坐车,忘记了要坐哪路车,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直到天黑。

当然,您不用猜也知道,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否则今天我也没机会在这儿给您痛说革命家史。

非常感谢广播学院的刘济南院长,她很重视此事,马上就广电部了解情况,为我争取这个名额。而她发现,事件的缘由简单得可笑:毕业分配前夕,广电部干部司曾经问过中央电视台:“你们今年招播音员吗?”央视的回答是“未定,不好说”。于是当央视最终定下一个人选,临时告知广电部,对方不干了。问你的时候不说,现在想起来要名额了?没有!来了个下马威。

别人没收拾,光收拾我了,三天瘦了一大圈。

现在想想,太好笑了。

拿到中央电视台的出入证后,我郑重地把它挂在脖子

上,和哈文在央视大楼前面照了一张合影。有时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什么事儿,也会把这张出入证拿在手里,摩挲来摩挲去,反复端详,心中五味杂陈。

这天中午,我又在欣赏出入证,老觉得背后有人,扭头一瞥,没看见谁,于是继续欣赏。

不对,还是觉得有人,使劲儿一回头,这下看见了。

“石老师!”我“噌”一下跳起来,立正站好。

站在我背后的,是纪录片《空中丝绸之路》的总导演石宪法。

“是不是感慨良多啊?”他笑眯眯地问我。

听这话,应该是瞅我半天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李咏,这只是个开始。你等着吧,不出两三年。”他在我脑门儿上点了一下,“你这块尖石头,就会被磨圆的。”

我一向不相信宿命,那太唯

心,但我不反对命中注定的事儿,比如天上掉馅饼,正砸我头上。这不,当我在央视默默无闻混了7年,眼看就要奔三,却只成家未立业,《幸运52》来啦!

1997年,我29岁,在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当导演兼主持人。工作能力尚可,公众知名度为零。台里的同事说起李咏,熟点儿的,知道是《天涯共此时》主持人,不熟的,只知道我是成天张罗两岸寻亲,帮“北京刘大妈”找“台湾王大爷”,“老坐着,腿有毛病”的那位。至于长相,记不清!

一天,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突然找上门来,让我为一个外国宣传片配音。配音是我老本行,不过这片头让人十分费解,跟我以往配的那些历史片、纪录片、科教片都不一样。花花绿绿,闹闹哄哄,几个大写英文字母“GO BINGO”。

我问我同学:“这什么意思?”

“去博彩!好玩儿着呢。”

“哦,博彩,看看!”

我这位同学年龄不大,来头不小,是欧洲传播管理顾问公司(ECM)驻中国首席代表。

ECM公司,在全球娱乐界都是响当当一块金字招牌。他们靠着做节目、卖技术、卖服务起家。《GO BINGO》是他们的看家大戏,在英国持续播出30年,长盛不衰。我同学的任务,就是给它在中国找个好买主。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在中国兜售外国节目,难上加难。要不她怎么找着我了呢?就我这嗓子,在配音界有多大名气不敢吹。但我当年“冒充”赵忠祥老师配过的一期节目,直到今天也没人听出过破绽。

按说,作为一个资深配音演员,我也挺见多识广的,古今中外,啥节目没见过?但眼前这个《GO BINGO》愣让我看傻了。